

論王韜《瀛壖雜誌》之權力象徵與時代性

余 妘 珉*

大 綱

- 一、前言
- 二、方志書寫：做為建立主權的象徵
- 三、筆記形式：建立主權的失落
- 四、雙重象徵中的真實：上海的複雜呈顯
- 五、結語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王韜《瀛壖雜誌》以方志內容與筆記形式來記錄晚清巨變的上海，而本文企圖透過分析方志與筆記特質，探討創作手法所呈現之權力象徵，並進一步討論其時代意義。

方志所代表的不只是分門別類地記錄區域，而且還以客觀中立、不證自明的方式宣告地方所有權，因此《瀛壖雜誌》便有著建立主權的象徵。但是其隨筆記錄的形式，使內容難以被掌握，方志功能因而受限；此外，加上主觀情感的滲入，使得《瀛壖雜誌》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客觀與普遍，而成為獨特的個人文本。於是讓具有方志內容與胸懷的《瀛壖雜誌》沒有順利地完成其權力象徵與運作，更精確地說，《瀛壖雜誌》帶有權力的建立與失落，這樣雙重的象徵。

本文進一步探討發現，這種雙重象徵呼應了晚清時期主權淪喪、中西混融、新舊交雜的上海，文本陳述透顯對各項事物的不確定、遊移，反而更接近上海這種轉變、複雜及多元特質，而其時代性便從這些衝突矛盾中展現出來。

關鍵字：王韜、瀛壖雜誌、上海、方志、筆記、權力象徵、晚清

一、前 言

王韜(1828~1897)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具有前導的地位，是中國接觸西方的早期知識份子。他經歷了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遭遇到強烈的西方勢力。

不過，王韜的歷史地位，卻是時代的巧合所造成，他所接受的還是傳統國學教育，背負著家族的期待，參加科舉考試，且在十七歲時中了秀才。但是之後因為家貧，不得不開館授徒，其後的科舉考試皆不順遂。1849年在上海授徒的父親病逝，為了家計，他於該年前往上海，在傳教士麥都思開設的墨海書館擔任協助翻譯的工作。這段上海經驗，可說是王韜生命的轉捩點，一直到1862年，因為與太平天國有所聯繫，於是在清廷的緝捕下逃往香港，在那裡，他有了更多開啟眼界的機會，奠定了他在華人報業的先鋒地位。^{註1}

於是當我們談到近代報業史，就絕對少不了王韜，但是王韜接觸出版的契機，卻是始於上海經驗，「王韜選擇辦報作為自己的第一職業還有其特殊的個人背景...早在上海時期，他就接觸到印刷和出版事務。墨海書館本身就是一個印書局，屬英國《字林西報》的附屬機構。他的雇主麥都思還是中國境內早期中文期刊《遐邇貫珍》的創辦人。王韜在墨海書館的工作，除了佐譯聖經以外，就是負責出版文字的校對和發送《遐邇貫珍》。」^{註2}論及王韜是認識西方的先驅，也要追溯至上海時期，因為墨海書館除了出版聖經，還出版西方科技書籍。

此時的上海正在轉型。1843年上海開埠，1845年公佈租界章程，於是本

註1 王韜至香港後，先是跟隨英國友人理雅各遊歐兩年多(1867-1870)，接著創辦了第一份華人自辦的報紙《循環日報》(1874-1885)，發表許多政論。之後又曾遊日(1879)，眼界已不可同日而語，著作亦豐，其先鋒地位也在此時奠定。

註2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11)，頁147。

來上海只有舊城東南方比較熱鬧，北邊與西邊則是一片荒蕪，卻因為劃定租界，英美法在一無所有的地區發展出全新的異國景象。開埠與劃定租界帶來了雙重的意涵，一方面代表著中國主權的衰落與西方列強勢力入侵；但是一方面又帶來商業的繁榮，也開啟了西方科技文明傳入中國的大門。於是從經濟模式、地景一直到生活方式、價值觀，都不斷地衝擊著上海。王韜見證了上海初期的改變，在滬期間陸續增補《瀛壖雜誌》。^{註 3} 本書的筆記形式帶著個人性，但是他又是以地方志的眼光來寫上海，不但他個人如此認定，後人也以「縮本上海志」稱之，比起出於興趣的紀行之作更加嚴肅。在這個獨特的角度下，文本再現了王韜的矛盾性與其眼中複雜面貌的上海，因此光是把《瀛壖雜誌》當作上海史料，或是把它視為王韜的生命歷程，都顯得有些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韜選擇這樣寫作方式的意義，以及這樣寫作方式產生的結果。《瀛壖雜誌》一方面試圖以方志內容建構上海的空間與歷史，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比一般的史書著作滲透更多作者的個人印記，而個人性又來自於與時代千絲萬縷的互動關係。而在這樣的雙重交疊下，又代表著什麼樣的時代意涵，值得加以探討。

二、方志書寫：做為建立主權的象徵

很明顯地，王韜以方志的角度來撰寫此書，直接從內容就可以看出來，^{註 4} 而且在一些論述裡，王韜對該書的定位或期許也是如此。王韜在《弢園著

註 3 王韜《筆記續編·瀛壖雜誌》(台北：廣文書局，1969)，以下引文，直接標明頁碼，不另加註。

註 4 《瀛壖雜誌》的內容大致為：卷一包括疆域沿革、海防、地理景觀及歷史、水利、水文、傳說、時下風氣、航運、商業活動、娛樂活動、妓院、民俗節慶、物產等等；卷二包括酒肆、民生、器物、物產、傳統產業、手工業、田賦、戶口、海運、倉庾、海關、善堂、學校書院、祠祀、寺觀、名蹟、園林等；卷三包括新興政府

述總目》中提到此書云：「是書專記上海一邑之事，邑志苦於繁重，且詳於遠而略於近，此則遺聞軼事雖瑣屑而必書，亦厲樊榭《東城雜記》之流亞也。」^{註 5}表明了邑志內容太過繁多，而且對於近事的紀錄也較為缺乏，該書份量則較輕薄，而且補了邑志的不足，可以說是邑志的縮簡本、補充本。

在《王韜日記》中也幾次提到《瀛壖雜誌》，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記載了給老師江翼雲的書信，其中提到將修邑志的消息，自己也曾寫了《瀛壖雜誌》兩卷，日後也還有增刪。^{註 6}另外一則在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記錄了呈前任觀察吳健彰的書信，提到聽聞當局想修邑志，對此事相當肯定，接著說「瀚昔著有《瀛壖雜誌》一卷，自謂於滬城掌故，略有所知，惜以荐更多故，業遂中輟，近時事實尚未編錄，倘能假以歲月，或有可觀。瀚屢欲陳諸左右，而苦無其端。今聞荷汀黃先生欲修邑志，此不可失之機也，故謹繕寫上呈。如蒙大人不棄，採厥蕝蕝，賜以刻賞，俾付手民，則感且不朽。」^{註 7}當王韜提到該書時，都是先談到修邑志一事，一方面或許是當局開始重視邑志，讓王韜也趁機推薦自己的著作，一方面也是認為自己的這部作品，和邑志有著相似的內容與特色。除此，王韜也把《瀛壖雜誌》的教化性功能與邑志相提並論。給江翼雲師書信中提到：「瀚前著《瀛壖雜誌》二卷，曾經夫子訓正，許為有裨於世道人心。」^{註 8}呈前任觀察吳健彰的書信則說：「政事文章，其為報稱一也。

機關（製造局、廣方言館、火藥局）、戰事、人物（英勇抗敵之士、文人、藏書家、金石家）等；卷四主要寫人物，包括書畫家、醫家、才女、節婦、方外、賢吏、文人；卷五包括人物（文人、義士）、異事、名妓、園林名勝、奇物、娛樂活動（說書、戲曲）等；卷六主要寫與西方相關的事物，包括上海通商及劃定租界之事、領事館、傳教士、教堂、印書館、西醫、學校、博物館、器械船砲、報業、賽馬、馬戲團等。

註 5 轉引自《上海方志資料考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12），頁 490。

註 6 方行、湯志均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07），頁 45-46。

註 7 同上註，頁 63-64。

註 8 同上註，頁 45-46。

政事澤及一時，文章功流千載，其可以鑒得失、紀善惡、辨賢愚、定褒貶、別是非，信今而傳後者，莫如邑志若矣。」^{註 9}可以看出王韜認定《瀛壖雜誌》的價值，其實與邑志是相當接近的。

但是，史實的內容很多，為什麼王韜會以方志的眼光來經營，其中隱隱透顯的意義，很值得討論。方志象徵什麼呢？其實就像史著一樣，每個地方都有歷史，每一代人也都在記錄、建構歷史，以佔據、銘刻時間的方式，宣告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方志則是兼具史地性質，屬於較短時間的橫向紀錄，也就是相對地比較接近空間的記載。來新夏解釋了方志屬性的各種說法後，提出頗為中肯的見解，他認為方志相較於地理學來說，雖然比較接近史學，可是獨具屬性，是一種在地理、歷史滲透交融基礎上形成的綜合性學科。其結構為「志體主要是記述現狀，將事物作橫向的分門別類的縱述。」；在內容「則以廣泛而豐富見長...事無巨細，只要有意義，都在記述範圍內」；成書方式為「志則以記載現狀為主，要求詳今略古，每隔一定年限就要重修...大量資料必須從當時當地搜集調查而得。對已有資料尚須核實增補。」；其特點為具有「地方性、連續性、廣泛性、資料性」。^{註 10}也就是說，方志注重的是區域的、廣泛的當下紀錄，因此實用性更強。為誰所用呢？當然是當政者。來新夏提到方志的作用有三，其中一項就是「資治」，「因為它詳盡地記載著一地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可以輔助施政者了解情況，制定對策以推行良好的吏治。」^{註 11}因此方志跟當政者的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這種相當實用，直接與政治相聯繫的方面之外，更隱含著一個意義，那便是劃定疆域，宣告佔有與主權。丹尼斯·渥德在《地圖權力學》中提到：「地

註 9 同上註，頁 63。

註 10 來新夏《中國地方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09)，頁 18-29。

註 11 同上註，頁 29。

圖不僅記錄與顯示，同時也要求並證明了對於土地管轄的轉變，以科學及文明之名，國家及人類進步之名，而予以佔用。」^{註 12}也就是說，繪製地圖並非只是去呈現這個區域，而是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宣示該地的管轄權。因此該書中也提到「州的存在並非自然，而大抵是屬於地圖的存在，因為繪製一個州，便是確認它的領域之呈現，若略去不畫，便是否認它的存在。」^{註 13}也就是說在地圖上，當一個區域被呈現出來的時候，就表示確定並承認它的存在，反之則否，這是帶有宣示意義的。方志和地圖相類似，方志最開頭常常置放該區域的地圖，接著分門別類、龐大博雜地記載當地的疆域沿革、山川水文、行政機關、各類機構、職官賦稅、各種建築、人物與風土民情等等，功能效力是相同的。因此王韜選擇撰述方志內容的作品，似乎可以讀出除了記述史料之外的含意。尤其是在道光、咸豐年間發生了震驚中國的戰爭，主權至此開始逐漸淪喪，上海也被迫開埠、劃定租界，形成國中之國的奇特狀態。王韜一方面急於見證時代，留下紀錄；一方面選擇撰寫上海方志內容的作品，因此《瀛壖雜誌》似乎就表現出了重建主權的象徵。

三、筆記形式：建立主權的失落

雖然《瀛壖雜誌》承載著方志內容與定位，但是否真的完成了權力宣告的象徵？恐怕是有疑問的。因為王韜採取筆記形式，使得在編排上較無系統，以及個人性無可避免地滲入，都影響了這樣象徵的完成。

《瀛壖雜誌》具有方志的資料性及龐雜性，可是卻因為他選擇了筆記的形式，因此沒有方志的條理清晰，分類明白。呂叔湘提到筆記的特點，認為：「筆

註 12 丹尼斯·渥德《地圖權力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03 初版三刷)，頁 67。

註 13 同上註，頁 176。

記作者不刻意為文，只是遇有可寫，隨筆寫去。」^{註 14}是一種相當隨性的文學體制，王韜自己也談到他寫這些東西是偶有見聞，隨筆寫下，因此並不是經過嚴整的規劃。二者結合，使這本「縮本上海志」有著方志的胸懷，可是又有隨筆性質，造就其一卷之中容納各種主題的狀態。或許可以說，因為此書只是補邑志之缺，所以不是每項具備，內容也多寡不一，所以難以分卷，只好數類合卷。但是每卷既無目錄，每則也無標題，若不閱讀內容，也難以得知一卷中有哪些內容。於是「卷一」、「卷二」這種標明方式，似乎只是一種分段功能，並不能凸顯整部作品的結構。

這樣的安排，使得王韜對上海的建構，呈現出有趣的現象。各種內容幾乎混雜一起，地理景觀、市民活動、幾種身份的人物、物產、西方器械、建築機關等等。在沒有標題的提示下一一讀去，一個意象開始浮現。一個文人行走於上海城市的街道，隨著他走過的地方，看到他所看到(或所想看到)的人事物，讀者無法知道接下來會遇到什麼。甚至讀完了之後，若不一一筆記標示，一切還是散落在各處。筆記性賦予了這個有著方志內容的文本難以標誌的特點，不像一般的方志，目錄式的、百科全書式的，把城市拆解成一個個的標本，分類放置，供讀者掌握、認知。既然難以掌握與認知，其功能的發揮便受到限制。不過，《瀛壖雜誌》表現出無法標誌、命名、掌握的特點，似乎更能表徵正在天翻地覆發生變化的上海，二者有著相似的時代性。

另外，筆記性也代表著更多個人性的介入，有作者情感的滲進，讓看似客觀、中立、公正的區域紀錄也轉變了。丹尼斯·渥德提到，「地圖之所以有力，正是在於作者……消失了，只有當作者不被察覺，地圖奮力要呈現的真實世界才能夠物質化(也就是，被視為是這個世界)。」^{註 15}地圖(尤其是一般性參

註 14 呂叔湘《呂叔湘全集·筆記文選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12)，頁7。

註 15 同註 12，頁 119。

考地圖，非主題地圖)為了取信於人，讓權力運作發揮作用，就要讓地圖看起來公正、客觀、透明、中立，沒有任何主觀因素介入，營造出地圖就是指涉真實世界的幻象，於是其中的利益選取、權力考量，才會被隱藏，讓一切顯得自然而然。但是「在地圖的文化內容得以自然化之前，地景的自然內容須先經過人文化成，才得以存在。這是一種文化的勞動，一種指認、劃界、命名、編目的勞動……它是一種繪製地圖的勞動。」^{註 16}所以，在人為的佔領、命名、標示了某個空間之後(即自然人文化)，必再經過人文的自然化，把這個被框定的區域，以一種自然、科學、客觀的方法呈現，使得這一切人文化顯得自然而然，無須證明其合法性。也就是說，地圖有其權力的運作在裡面，但是越顯得自然、不證自明，就越有力，人們將這一切毫無懷疑地接收下來，其實也接收了其中的意識形態。

方志效用的完成也很類似，方志一方面會宣稱繼承傳統歷史的道德教化觀，講求的目的是讓當政者可以快速全面地掌握該區域，這是基於管理的實用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方志對該空間全面廣博地記錄，而且無特定的主題與觀點，也是用一種客觀記錄的態度，把該地的管轄權自然化。每一次的修志，便更強化這種印象，讓區域的存在顯得無庸置疑，因為本來自然如此，無須證明。

但是王韜個人性的介入，則讓作者鮮明地突顯出來，譬如王韜評論上海俗尚、西方的人事物，抒發對現實的感懷，甚至還有一些個人的經驗。這些都把一個看似普遍性、客觀性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轉化成為個人性、主觀性的文本。讓《瀛壖雜誌》表現出基於某些價值觀與經驗而建構，於是在閱讀之時，很容易意識到這是屬於王韜的上海文本，它帶著獨特經驗的筆記性質，終究和一般正式規格的方志有些距離。如此一來，權力自然化的運作，就悄悄地被削弱了。

註 16 同註 12，頁 129。

不過，王韜選擇筆記的形式是可以理解的，在時代驟變之時，已經無法滿足於單純的紀錄，也有其不得不抒發情感的需求，因此筆記的形式讓他更好發揮。不過也因此，讓具有方志內容與胸懷的《瀛壖雜誌》沒有順利地完成其權力象徵與運作。或者可以更進一步說，《瀛壖雜誌》帶有權力的建立與失落，這樣雙重的象徵。

四、雙重象徵中的真實：上海的複雜呈顯

主權建立與失落的文本意涵，或許正表現著當時國人的處境，以及上海所展現出來的意義。上海的開埠與劃租，讓國人深刻感受到主權的淪喪，但是卻又無法抵擋這樣的情勢；另一方面也開始正視列強勢力究竟帶來什麼樣的現代化事物。在主權建立與失落當中，表現出來的是，在這樣的衝擊之下各種混雜與變動的事物之存在，而不是一個靜置統一的城市。因此文本陳述中對這些事物的不確定、矛盾與遊移，反而更接近上海這種轉變的、複雜的、多元的特質。

而王韜的個人經驗，也讓這種矛盾感更加深刻。王韜身為傳統的知識份子，因為時代的變遷，最後不得不棲身在西方傳教士經營的墨海書館，開始接觸到一些西方科技與宗教，因此總是懷著衝突的心理；此時上海也被迫開始了種種明顯的變化，已經不可能再擁有單一的面貌。因此《瀛壖雜誌》在王韜的建構下，混和著看似不相融的諸多元素，以及在陳述中透顯出來的矛盾態度。但是文本中的矛盾，顯現出國人開始被迫面向西方，思考現代化的起點，與在傳統價值之間的徘徊。

雖然方志體著重在短時間內的區域紀錄，但是王韜捉住的時間點正好是上海開埠劃租前後，因此種種變化的痕跡顯而易見。《瀛壖雜誌》不僅僅包含著傳統上海及西方進駐這樣中外相對的元素，還展現了上海快速成為現代性都

市，所展現的風貌。這種都市特質，不只是傳統、西方兩兩交錯這麼簡單，還有著混融了之後，產生出不盡同於傳統或是西方的新狀態，尤其是在商業活動及風氣氛圍上的變化。或許可以這麼說，《瀛壖雜誌》呈現當時上海的三個層面，其一是舊上海，其二是西方事物，其三是新上海，或是都市化的上海，因此文本所展現的層次包括中西衝擊與新舊對話，王韜在描述這些上海樣貌時，除了可以看出內容上中西、新舊事物雜陳，也可看出王韜面對這些外來或自發的新樣態時，矛盾猶疑的態度。

以下便分析《瀛壖雜誌》中呈現複雜的上海面貌，以及王韜面對時代衝擊的矛盾心理。

(一) 上海新樣態的描寫

1、物產器械

在《瀛壖雜誌》卷一、卷二中，王韜花了不少篇幅記錄上海的物產，幾種魚類、蟹類、蔬菜、水果、植物、花卉（頁 32-37）等等。除此之外，上海開埠後成為商業重鎮，各樣南北品貨聚集於此，往來交易，亦增其豐富性，充滿著土地的豐厚。他提到：「滬之物產，遠不逮閩浙，魚鹽之利，兩無所居，古所稱窮海也。然外至之貨，駢集市廛，亦足云富。水族則自遠而畢赴，植物則昔無而今有，加以西土奇珍，目所未覩，尤為他地所無。」（頁 32）又云：「滬上地僅彈丸，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殊多，自不能識，口不能名。偶詢之西人，其名輒至五六字，聾牙棘舌，亦不能以中國文字紀也。」（頁 40）這兩段文字表現出上海在物產上的今昔之別，上海本地的物資其實並不那麼富足，多靠外來之貨，尤其開埠後帶來廣大的經濟利益，各類物產皆匯至上海，甚至也有舶來之貨，在晚清是相當特別的景致。

物產本即為方志一項，記錄相關資料很正常，可是王韜屢屢提及舶來之物

亦多，卻因為不知其為何物，且名字又難記，所以便放棄這些外來物產，實在可惜。其中只有一條提到「北郭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種不識其名，形如油菜，而葉差巨，青翠可人，脆嫩異常。冬時以沸水澆之，入以醃醬，即可食，味頗甘美。」(頁34)這還不是出現在市場裡的，而是洋人自行栽種的蔬菜，跟其他大篇幅羅列的中國物產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或許王韜認為中國的物產豐厚，遠非西方可比；或許更重要的，他認為西方來到中國的東西，最矚目的並非這些物產，而是傳進來的新興技術與奇巧器械，而且，這些也是中國所缺少的。

王韜提到「滬肆諸物騰貴，談箋濮刀，著名已久，今皆失其初製。闐闐間所陳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勑立新法，巧不可階。如觀星鏡、顯微鏡、寒暑針、風雨針、電器秘機、火輪機器、自鳴蟲鳥、能行天地球之類。下至燈瓶盂碟，一切玩具，製甚精巧，亦他地所無。」(頁40)這裡列出當時上海商店販售的種種奇特器物，都是中國所無。王韜宛如流連在這些嶄新的商店中，外來的新奇物品讓人目眩，字裡行間不時流露出好奇及讚嘆。另外在卷六也提到「洋涇濱為西人通商總集……以及假手製造之具，悅耳藥曼之音，淫思巧構，靡物不奇」(頁158-159)提到奇巧的西洋器械給他的感受，這些東西遠比外來物產給人更強烈的震撼。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最早始於外物模仿，因為外在之物最顯而易見，既有衝破中國的武器，又有帶來便利的科技。反倒書中寫到跟中國有關的器械方面，篇幅最多的就是與上海植棉業及紡織業相關的器物，也就是屬於傳統產業的部分。

因此，以「物」的觀點看《瀛壖雜誌》時，可以發覺，其中融合著豐饒土地的象徵，以及船堅砲利的西方印象。雖然這是當時整個中國遭遇西方的一幅圖像，不過，上海又因為直接接觸西方，有著「他地所無」的種種事物，所以這樣的風貌便明顯地凸顯在文本中。

2、商業活動

上海最主要的傳統產業為植棉業，以及隨之而來的製棉業及紡織、製襪等手工業，王韜在《瀛壖雜誌》中也仔細地描寫了製棉業的過程。(頁 41-46) 但是上海繁盛的商業活動，也是相當引人注意的。上文已經討論到上海各地物產聚集的狀況，而物產聚集便意味著貿易活動的活絡，文中便提及「閩粵大商多在東關外，粵則從汕頭，閩則從臺灣，運糖至滬，所售動以數百萬金。於滬則收買木棉載回其地。」(頁 21)，以及「滬之巨商不以積粟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數十艘，駛至關東運販油酒豆餅等貨，每歲往返三四次。偶失於風波，家可立匱。」(頁 20) 由兩段引文便可略窺上海物產出口入口的景象，還有交易金額之龐大，已經遠非傳統自給自足的狀態，傳統的製棉業也這樣加入了新興都市的貿易行列當中。

而且上海也是西商往來之處，於是各地商人便運貨至此與西商交易，「滬地百貨闐集，中外貿易，惟憑通事一言，半皆粵人為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購者，以絲茶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於華者呢布羽毛等物，消亦不細。」(頁 20) 此則為中外貿易的概況，而居中交涉的通事，更是大獲其利，可見上海國內外商業活動的繁盛。

因此《瀛壖雜誌》刻畫描寫傳統行業的狀態、物產聚集的豐足樣貌，還穿插著商業貿易活動，讓大量羅列的靜態物品開始流動起來，便是這樣包含時間與空間，動態呈現上海從傳統城鎮到新興城市的過程。

3、人物

方志與史書一樣，都列有人物一項，而且份量不少，《瀛壖雜誌》亦是如此。他選錄的人物以文人、詞章家為大宗，其次為藝術家，如畫家、書法家、鑑賞家，另外還有醫生、才女、節婦、忠義之士等等。這些大抵上是繼承傳統

邑志的，雖然也有補邑志不足，如之前邑志節婦記載三百餘人，才婦則寥寥(頁100)，王韜便特別多加著錄一些。

《瀛壖雜誌》中的文人、詞章家大多是傳統知識份子，通常長於詩詞文章，博學多聞。藝術家所擅長的自然是中國繪畫及書法、篆刻之類，不過在繪畫上，已經有人開始借鑑西方繪畫。文中云：「吳漁山與王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滃渺凌虛，迥異平日。」(頁145)《瀛壖雜誌》呈現了上海畫家的特質，雖然大多數以中國傳統方法作畫，但是也有少數學習西方畫法的，顯示出上海畫壇的一般狀態與變化。才婦一項，王韜特別多選錄一些，這也是較為特別的一點。王韜感於這些才女或善詩文繪畫，或博習經史，卻不見史傳，不免有「懷才不如守節」(頁101)之慨，因此就其所知聊錄一二。雖然人數不多，但可見王韜對女性的評價，已不僅僅限於貞節一門，也對才女給予肯定。《瀛壖雜誌》中表現的女性特質，也比以往的邑志還要多元了。忠義之士方面，晚清內憂外患，上海亦幾經戰火，此間多有可歌可泣之事，王韜著錄抵抗外侮或亂匪而殉國的忠義節士，帶著鮮明的時代感受。節婦則或抵禦暴力而殉節，或守寡撫孤，王韜讚揚其抗暴守節的情操，這與傳統價值觀倒是沒有差別。可以看出，《瀛壖雜誌》的人物構成上，大多是較為傳統的，畢竟當時正是處於轉變初期，雖然受到西方衝擊，但主要在科技器械上，至於知識、文化結構，大體傳統色彩還是濃厚。不過其中文人的份量很多，而且傳統文人與近代知識份子同列其中，頗具有時代色彩，值得再進一步深入討論。

這些傳統文人，有為官者，也有舉制屢不售而放棄科舉者，或是隱逸文人。王韜介紹他們的人格、行事以及著作，大多是能文善詩的才俊之士，也有一些研究經學辭賦的學術中人。譬如其中便提到劉熙載(1813~1881)，劉熙載在仕途上算是順遂的，曾官至翰林院編修，「以廣東學政引疾歸里，為經師設帳

授徒，安貧樂道，怡然自得，著有《昨非集》、《藝概》兩書。」之後又應聘前往上海龍門書院講學，「嘗謂士人胸次，不可一日無光明磊落氣象。洵哉是言，足以觀劉君學養矣。」(頁 124) 等等。劉熙載也是身處於世變的知識份子，但他的整個知識結構就完全是傳統文人的形象。

可是，《瀛壖雜誌》中也記錄了一些研究西學的知識份子，譬如馮桂芬(1809~1874)，也曾中榜，但是「長於曆算鉤股之術，罷官後究心西學，避兵至滬，當事延主敬業書院...廣方言館既建，中允總司厥事，一切章程，皆所擬定。」(頁 122) 等等。馮桂芬提出種種改良主張，並提倡學習西學，是近代思想啟蒙的重要人物。另外也提到王韜的好友兼同事李善蘭，「壬叔於天算之外，出其餘技為詩文.....在滬十年，著有《續幾何原本》、《談天》、《代數學》、《代微積拾級》、《重學》、《植物學》等書，皆與西士從泰西算術中紬繹而出之者也。」(頁 114) 另外還提到一些人士，如：華蘅芳(字若汀)「通天算之學」，還有「同邑徐雪村有巧思，於泰西機器之術，能知其奧。同治初元，設立廣方言館、機器局，延通於西學者紬繹各書。若汀、雪村應聘而往。」(頁 118) 或是張南坪「通天算之學.....生平布衣蔬食，居貧耐苦泊如也。橐筆海上，時與西士紬繹疇人家言，然未有成書。」(頁 135) 這些知識份子幾乎以傳統國學為根底，但是或出於自覺，或為了謀生而協助西人翻譯書籍，因此有機會接觸西學，王韜自己便是屬於後者。

從這些人物可以看出近代知識份子群的混融性，以及知識結構正在逐漸地變化。《瀛壖雜誌》記錄嘉慶以降的文人，因此可以看到鴉片戰爭前後文人的轉變；再加上當時的上海剛剛接觸西方，因此許多知識份子擁有傳統學養，卻不得不面對西學，凡此都留下了痕跡。

4、地景建築

上海呈現的混雜性，也包括建築，畢竟租界的西式建築與傳統園林，是相當不同的景象。王韜在書中記錄上海種種園林名勝，如：吾園、宜園（頁 64）、豫園（頁 143-144）等等，皆是有樓、有亭、有池、有橋，栽植各種樹木植物，或有各種奇石等等。這些名勝古蹟，代表著上海從過去到當時在空間上的傳統遺留。

但是租界的建築，則又是另一番風貌，王韜提到「洋涇之濱，蕩溝之側，西人構屋於此。居如櫛比，旭日初射，玻璃散彩，風景清絕。室外繚以短垣，華木珍果，列植庭下，甃地悉以花磚，雖泥雨不滑。」（頁 168）等等，以玻璃為窗，鋪上地磚的西式建築，和古典的中式建築共處一塊區域，王韜還以中國文人的審美觀點說西式房屋「第室止數椽，無曲折深邃之致，為可惜耳。」（頁 168）

鄭祖安提到租界建築高樓，開始時多西式房子，但是小刀會之役時，許多華人避入租界，於是外商趁機造許多木板房出租給華人，而形成了上海里弄住宅，之後改以磚造。這些里弄住宅是結合歐式與中式的建築，更具有混合之風。^{註 17}王韜很隨意地記錄了上海的建築，園林為方志一項，在記錄時尚較集中，但是西式建築，卻是散見幾處。可是就是如此，上海中西交雜的風格，也在文本中呈現出來；而園林的典雅曲迴，與西式建築之明亮潔淨，兩種不同的美感也同時融合於文本當中。

5、節慶娛樂

王韜在「卷一」記錄了上海的歲時節慶，從元旦一直寫到除夕，還包括一些廟會慶典，描寫上海人如何過節，有著什麼樣的活動，人群的歡樂等等。這些傳統的重要節慶，當然還是保留下來。王韜對這些慶典持著相當肯定的態

註 17 鄭祖安《百年上海城》（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04），頁 96-97。

度，雖然對上海尚奢風俗多所批評，但是說到新年的活動則認為「雖風俗喜奢，亦足見昇平氣象也。」並感嘆「自癸丑之秋，經赭冠之亂，久不見此樂矣。」（頁 27）似乎節慶的熱鬧蕭條與否，象徵國家的衰亂或和樂。而且也寫到除夕夜晚，總是有人不求回報，拿著錢米幫助貧窮人家過年，認為「此風俗之最厚者也。」（頁 32），這除了表現出民風的淳厚之處，其實也表現了對此重大節慶的重視。

在這些傳統的節慶之外，王韜也注意到因為租界的劃分而帶來的西方娛樂，「卷六」寫到西人善於操舟，常常在夏秋之交競舟。另外也大幅引用他人描寫馬戲的文字，對於這些新興活動顯得相當新鮮與好奇。

除了這些傳統節慶與租界活動之外，城市的興起還是帶來了一些其他的消遣活動，譬如「賭館烟舍，鱗次櫛比。」（頁 19）、青樓妓院臨立（頁 24），還有一些遊手好閒之人、紈褲子弟喜鬥蟋蟀、鶻鶻（頁 21-22）等等。似乎無可避免的，這些負面、感官的消閒娛樂，也隨著商業、人口的集中，開始發展起來。

這些文字不僅反映了上海活動複雜多元，也反映了王韜對於傳統活動的重視，以及對新興活動的讚嘆。不過也可以看出，此時王韜對西方還是比較停留在外在事物上。傳統節慶代表著中國深根文化與思維的具體展現，但是馬戲表演、賽馬、操舟，就算在西方有著什麼樣的傳統，但是國人大概也只是將之視為新的運動娛樂。不過這些西方帶來的活動，還是成為國人對西方印象的一部份。另外，上海當然也不只是這些活動而已，還有賭館、烟舍、妓院等等場所，王韜對此自然憂心，民風隨著都市興起而漸起變化，也展現在其中。

（二）對上海新貌的矛盾心理

雖然在文本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上海的種種改變，中與西的混雜碰撞，

但是王韜對這些改變是有著矛盾心理的。對西方事物一方面稱讚，一方面貶抑，有著搖擺不定的姿態，對於新興上海城的風尚，更是多所擔憂。

前面也提到王韜對西方的器械充滿讚賞，但是一方面又認為國人在這方面早已超過西方，只是技藝不傳。如王韜便說過「嘗見南史祖沖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此其巧妙與西國輪船無異。但純用機槓，不藉煤火，制度稍殊耳，以其千里命名，迅捷可知。又楊么之樓船，激水駛輪，其速莫比，此亦西國輪船之濫觴。由是觀之，可知器物之精，中國已先西人而為之。惟異巧絕能，世不經見，人死即復失，傳世之人，又不肯悉心講求...俾器與人同亡，殊可惜已。」(頁 172-173) 這顯示了王韜這樣的知識份子，在對西方科技的欣羨以及中國自尊上的矛盾衝突。

另外，對於租界的風貌，如華屋、娛樂、商品等等，王韜雖多有形容，但是其中還是混著「雖窮極奢欲，暴殄已甚。而文人雅士來作勾留者，正可以之佐談屑、拾詩料。」(頁 159) 的心情。西方將資本主義帶入租界，促成了城市的興起，王韜對此風光有著好奇，但對於俗尚流於奢華還是有所不滿，譬如在文中提到「近來風俗日趨華靡，衣服僭侈，上下無別。而滬為尤甚，洋涇濱負販之子，猝有厚獲，即御狐貉，炫耀過市，真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廝養走卒，稍足自贍，即作橫鄉曲。衙署隸役，不著黑衣，近直與縉紳交際，酒食遊戲徵逐，恬不為怪，此風不知何時可革。」(頁 23) 論及上海尊卑不分，禮儀漸喪，崇尚華靡的狀態；或有一則「滬上習尚奢華，儀文放廢，而洋涇尤不可問。禮法之士，至於不欲見聞。」(頁 162) 等等，在在表示了對上海風氣轉變的批評，尤其是租界地區，更不可問。

對於上海日漸奢華的俗尚、傳統禮教不興，王韜常有歸咎西人之語，雖然他也提過「滬自西人未來之前，其禮已亡」(頁 22)，但是還是有「自西人寄居於此，閩粵之悍風愈熾」(頁 23) 的言論，將閩粵悍風愈熾和西人寄居連結

在一起；或是「滬人素不戒食牛，無賴子遍地宰屠……自西人來此，食牛者愈多，明目張膽，陳於市肆，不為異也……顧滬人既不惜物命，尤不惜物力，溝渠之間，粒米狼戾，恬不為怪。吁！暴殄甚矣，豈所以致福而昭和也哉。」(頁 42) 提到西人前來，導致食牛者愈多，其實這本來是不同的飲食習慣，但王韜因此進一步推出上海不惜物力，恐召禍害，似乎認為西人是讓上海風俗變本加厲的原因。這一方面記錄了上海的俗尚，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王韜對西人帶來的不同民風與價值觀的防衛心理。

可是他對上海新貌還是有著新鮮感，因此文中也說：「洋涇一隅，別開人境，耳聞目見，迥異尋常。」(頁 165)，對西方又同時有著另一種觀點，最多的便是讚賞西方科技，包括西醫、船砲、傳播業、照相術、燈火等等。除此也寫到西方女子「西邦女子，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遠望之殆若神仙……江南固多佳麗，如此者吾見亦罕，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矣。」(頁 176-177) 對於西方帶來的新、奇、美，王韜還是不免讚嘆一番。

因此，王韜對於侵略中國，可是又帶來新氣象的西方，既有防衛，又有好奇；既欣羨又鄙夷，複雜又矛盾，這或許也可以代表當時知識份子面對強烈外力的心情。而且可以發現一點，早期的知識份子對西方的認識大多停留在外在的階段，讚賞西方帶來的科技文明，可是內在價值大多以傳統為主，貶抑西方帶來的風俗。

五、結 語

在變革之時，一個知識份子身處複雜的上海，其思想與觀察，甚至是無意的建構與矛盾，都在文本的形式與內容留下時代痕跡。《瀛壖雜誌》記錄了許多史料，當然可以作為考察此時上海變遷的資料，但是它所呈現出來的意涵，

卻遠超過於此。如果只把它當作記載上海的史料作品，似乎忽略了作者在其中起的作用，以及文本展現出來時代象徵；當然純粹將它視為文藝性的筆記作品，則又忽略了文本與時代的關連。從文本的矛盾與缺口中，探討其中的隱藏意涵，與可能的時代意義，或許能提供另一個詮釋角度，展現王韜及其《瀛壖雜誌》與上海之間曲折隱微的關係。

王韜面對驟變的上海，選擇全面、資料性的方志眼光來寫《瀛壖雜誌》，但是又用筆記形式，以便抒發己見，且缺編目，因此方志的權力象徵，便被悄悄消解。於是《瀛壖雜誌》有著企圖重建權力又同時失落權力的雙重象徵，如此反而呼應著當時上海的時代意涵，而其中所表現出事物的多元性與價值觀的矛盾混融，也可以從中觀察一名晚清知識份子身處上海，如何建構這樣的都會，以及如何面對這樣的變化。

參考資料

(一) 書目資料

1. 王韜《筆記續編·瀛壖雜誌》(台北：廣文書局，1969)
2. 方行、湯志均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07)
3.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10 二版)
4. 《上海方志資料考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12)
5. 黃葦等著《方志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06)
6.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11)
7. 周迅《中國的地方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02)
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05)
9. [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03)
10. 來新夏《中國地方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09)
11.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台北：正中書局，1998.04)
12. 蔣英豪《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台北：臺灣書店，1998.03)
13. 鄭祖安《百年上海城》(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04)
14. 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出版公司，2000)
15. 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06)
16. 葉文心、羅蘇文、徐鼎新、熊月之、鄭祖安、魏斐德、張濟順《上海百年風華》(台北：躍昇文化出版公司，2001.06)
17. 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清末民初文化轉型與文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0)
18. 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08)

19. 呂叔湘《呂叔湘全集·筆記文選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12)
20. 丹尼斯·渥德《地圖權力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03 初版三刷)
21. 岑德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上海租界略史》(台北:文海出版社)

(二) 期刊資料

1. 邱國盛〈王韜與《瀛壖雜誌》〉《文史雜誌》1999 年第一期

An Analysis Study on Power Symbolizations and Times Features for Wang Tao's Yingruan Zazhi

Yu, Szu-Min *

Abstract

Wang Tao's Yingruan Zazhi had recorded the enormous changes of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using local gazetteer and biji strokes. Through the features analysis of this writing style, this paper mainl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splayed power symbolizations, and furthermore discuss their times meanings.

The local gazetteer shows not only classified local records but also its power operations, to objectively declare the regional ownership without any demonstrations; therefore, the contents of local gazetteer in Yingruan Zazhi symbolize the supremacy constructions. But such a function cannot be developed effectively due to the uncontrolled contents in the form of biji; in addition, the permeations of subjective emotions make the Yingruan Zazhi greatly depart from objectivism and generality, also let it gradually become a unique personal text without the power symbolizations and operations. To illustrate precisely, the Yingruan Zazhi possesses twin symbolizations, they are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ower constructions and its losses.

Further researches also discover these twin symbolizations had just responded to the supremacy loss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old and new thing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reover, the uncertainty and rove among old and new things described in the text should further approach the features of variation, complic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Shang-Hai, and their times features can be emerged from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 Wang Tao, Yingruan Zazhi, Shang-Hai, Local gazetteer, Biji, Power Symbolizations, Late Qing Dynasty